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7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七期 ★

目 录

关于科学人材的选拔和培养问题 楊朝傲 (1)

有效地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海 波 (6)

以身作则 吳介民 (14)

朝鮮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光輝業績 郝德青 (18)

从南斯拉夫經濟状况恶化談起 陈茂仪 (24)

所謂“特种战争”的真相 陈 原 (30)

新中国的考古学 夏 鼐 (35)

漫画：断水之魚 吳 耘 (32)

★ 九月一日出版 ★



关于科学人材的选拔和培养问题

楊朝傲

选拔和培养优秀科学人材，是建设我国科学队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把我国的科学技术从落后状态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决定的环节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拥有一批又红又专的杰出科学家的队伍。科学人材的成长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此，选拔和培养科学人材，需要有长远的和全面的规划。对于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的青年，要予以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这对于我国科学队伍的迅速成长，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选拔人材，才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材。我们的选拔工作是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政治歧视，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被选拔的机会，劳动人民的子弟很少有这种可能。固然，科学史上有过像出身于学徒的法拉第这样的人跨入科学家的行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中有许许多多的法拉第，他们也同样具有较好的禀赋和才能，却被黯然地埋没了。这是由资本

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科学人材，一向是十分重视的。我们选拔优秀人材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采取的方法是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进行重点选拔和重点培养，把普及与提高、数量与质量、一般与重点正确地结合起来，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造就必要数量的、质量很高的各种各样人材。只要质量，不要数量，就会使质量的提高缺乏基础；优秀人材的选拔工作，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后备队伍，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顾一般、不顾重点，就会产生培养工作上律拉平的现象，使人材的成长受到阻碍。

推动科学事业的前进，需要有集体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个人的钻研，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就一个科学集体来说，对于某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合理的分工合作，相互讨论，切磋琢磨，但主要的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辛勤劳动。个人的发展依靠集体，集体的进步又是建筑在每个人进步的基础之上。一个科学集体能够做出很好的成绩，常常是和



少数杰出科学家的作用分不开的。

科学队伍中有一批人“突出”，或者有人“冒尖”，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样就可能促进其余的人更加努力，更加进步，从而带动科学水平的提高。我们应当充分发挥集体之中每个人的积极性，鼓励每个人科学上的进取精神。当然，不能把个人钻研、个人创造、个人作用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不能认为，重点选拔优秀人材就会助长个人主义。如果否认人的才能和成就的差别，要求一律对待，那是不利于人材的成长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并不抹煞科学研究中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而是要我们正确地认识他们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同时，也肯定了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当时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要求和愿望有联系，所以，他们能够对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原理，对于科学史也是适用的。群众

和杰出人物的关系，在科学发展史上，具体地表现为劳动群众、一般科学技术人员和杰出科学家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在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和间接的参与下实现的。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少数杰出科学家的作用，放在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基础上，放在整个科学史上作过大大小小贡献的一般科学技术人员之中。自然科学直接依赖于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它是劳动群众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劳动群众即使是在被剥夺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权利的情况下，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劳动群众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力量。同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够离开一般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他们根据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需要，从事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这些工作是整个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组成部分。杰出科学家只有综合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才能够在科学事业上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科学研究中杰出人物的作用，主要是在于解决当代科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开拓科学发展的新方向、新领域，把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并且带动其他许多科学家的成长。他们总结了以往人们的研究成就，并且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实现了科学认识上的某一个飞跃；他们是集中群众智慧的代表人物。一个时代的科学水平也总要有



这样一批杰出人物来代表，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否认杰出科学家的作用，而且給予他們很高的評价。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視和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論学說。他們认为，达尔文的学說是十九世紀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如，恩格斯认为：“仅仅一門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維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紀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① 馬克思也认为：“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瑟貝恩，他們在这件事情中比一切經濟学者加起来还要重要”^②。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指定了高尔基等人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負責在最短期間为巴甫洛夫的科学研究工作，創造最良好的条件。列宁指出：“巴甫洛夫院士在科学上有对全世界的劳动者具有重大意义的十分杰出的贡献”^③。这些科学家在近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都是科学史上的偉大人物。他們在科学上的成就，是科学宝庫中珍贵的遗产。

杰出科学家所以能够推动科学事业的前进，是由于当时具备了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也是由于本人的努力和社会的培养。历史上一种科学理論的提出，是根据于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科学的水平。但是，有了这样的条件，还只是具备了一种可能性。杰出科学家的作用，在于他能够敏銳

地抓住并解决了科学发展中的关键問題，把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从而把科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有些资产階級唯心主义者认为，科学上的发现完全是出于科学家的灵感，是上帝的恩賜。这种說法只是替夸大个人作用的观点鍍上一层迷信色彩。与这种观点完全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科学上的某些規律的发现，都有它的社会历史的必然原因，由誰首先发现某一个自然規律或者提出一种重要的学說，則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恩格斯說：“恰巧某个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于某一国家，这一情况完全是种偶然性。但是，如果我們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者是会出现的”^④。这个原理不但适用于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也适用于杰出的科学家。

从整个科学史来看，由誰首先完成一种重大的发明創造，固然是偶然的，但是从杰出科学家本人来看，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

① 《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2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51頁。

③ 《关于保证伊·彼·巴甫洛夫院士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工作人员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4頁。

④ 《致亨·施塔耳肯堡》，《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506頁。



任务，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灵感，而是他辛勤地从事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在这里，社会给予这个科学家以有利的条件，又有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这种有利的条件，有的人尽管已经显示出优秀的才能，但是由于得不到培养和照顾，终于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可见，对于形成杰出科学家来说，社会的培养和工作条件是很重要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费尔巴哈在哲学思想上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他在很长时期内僻处乡间，一方面远离了社会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孤陋寡闻，使整个自然科学成就从他身边溜过。历史告诉我们，杰出科学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近代科学史上造就优秀人材的经验，以便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更好地进行培养科学人材的工作。

我们要及早发现优秀人材，以便能够尽早地培养科学上的新生力量。科学史上许多成功的事例表明，对于优秀科学人材的培养，要从他们的青年时期就开始抓紧。一个人在科学上要获得较大的成就，往往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因此就需要尽早地开始研究工作。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已露出头角，数十年间科学研究硕果累累。十八世纪数学家欧拉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数学的才能，在他的一生中，发表过五百多本书和论文，几乎涉及到当时数学的

一切部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二十六岁时就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可见，科学家如果能在青年时期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就能够积累比较丰富的资料，取得较多的经验，也就可能获得较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认为，从事科学工作时间较长就一定有较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科学的跑道上起步较早的“选手”，总是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所以，有希望的优秀人材一经发现，便要下定决心，从各方面提供各种条件来进行培养。

在培养科学人材工作中，要把严格要求和热情帮助结合起来。要督促他们扎扎实实地勤奋学习，善于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克服工作和学习中的各种困难，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实验技能，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树立良好的学风。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防止他们骄傲自满，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克服自己在思想上的缺点，引导他们在又红又专的大道上前进。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老一辈的科学家对青年要有严格的要求；每一个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有志于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青年，也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当然，严格要求，不等于不切实际地求全。应该针对各人的不同才能进行不同的培养。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当努力使自己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但同时，尤其应该努力发展自己的一种或几种专长。这样做，不但是为



了适应社会合理分工的需要，并且也考虑到各人在才能发展上的差异，以便因势利导，用其所长。“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受教育者在学习上要面面俱到，那是不对的，那就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样样通、样样松”的半瓶醋式的人物。这对于培养人材的工作是有害无益的。正确地实施“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把集体教育与个别辅导恰当地结合运用，把基础训练与特殊培养正确地衔接起来，才能够真正做到精心培养。

近代科学史上有不少培养科学人材的经验。不少国家都建立了选拔、奖励、培养和使用优秀人材的制度，采取了有关的措施。其中有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就是建立和发展一些学术中心作为出成果、出人材的科学基地。这种做法，曾经在不少国家里普遍地被采用，并取得显著的效果。这些经验，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适当采用。

近三百年来，许多国家建立了一批重点的高等学校、研究所、实验室，它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科学的发展和优秀科学人材的成长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个经验证明，以一批优秀科学家为核心组成的一个研究中心，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基地。在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科学分工精细、科学研究需要庞大的实验室和整套的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只有建立稳定的、有基础

的、组织得比较好的科学集体，才能适应科学工作的需要。十九世纪末以来，苏联、德国、英国、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研究室、实验室，都曾经先后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成功的例子。

建立这种研究中心可以更好地创造一个学术环境，形成较好的学术气氛，并且在长时期的工作中往往有可能树立起良好的学术传统。科学史的经验证明，学术上不同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交流学术经验，开展百家争鸣，促进人材的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一种学派不是少数人临时登高一呼凑个班子就能仓促组成的。一种学派往往是在解决重大科学任务的过程中，由少数杰出的科学家带头、精选一批研究人员而逐渐建立起来，最后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学术特色。一种学派的发展同历史上这些研究中心的建立往往有密切的联系。

培养科学人材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现有科学家的指导，培养出各方面的优秀科学家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我们的经验虽然不足，但是，只要善于学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善于发现人材，爱护和鼓励他们，用各种方法来精心培养他们，这个历史任务是可以胜利完成的。



有效地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 海波 ·

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只有有了发达的工业，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不断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劳动生产率是指人们的劳动的效率，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对所消耗工时之比。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求劳动者在同样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在生产同样一件产品过程中，消耗更少的劳动。任何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才能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一般是由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劳动生产率高，同样的劳动力在同样的时间内，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整个社会就有可能抽出更多的力量从事

科学文化事业，这些事业发展了，反过来又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高涨。劳动生产率低，劳动者在生产同样一件产品时，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就要多，或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的产品就要少。劳动生产率低，给社会带来的结果，是贫困和落后。任何社会要想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处境，任何新的社会制度，要取得巩固和发展，都不能不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比过去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曾经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也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的先进性，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在生产发展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在同样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为广大的人民提供更多的产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要依靠这种优越性从经济上并且也从政治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过渡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

同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8页。



高，一方面意味着无产阶级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则造成工人的失业，使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和贫困更加严重。劳动生产率越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越尖锐，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不受到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解决了阻碍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性的基本矛盾，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有了本质的差别，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与资本主义社会也根本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不会造成工人的失业，而且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满足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和社会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低了，劳动者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企业，代表集体利益的集体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人民群众都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高度的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说：“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劳动生产率随它的经济一同增进；这种经济，不仅包含生产资料的经济，且包含一切无用劳动的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一方面在各个营业内部厉行经济，同时又由它的无政府的竞争制度，造成社会生产

资料与劳动力的最无限制的浪费”^①。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你死我活的竞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是惊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有大批工人失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量物资被破坏，生产开工不足。这种人力和物资的严重浪费，大大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可能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合理使用物资和合理安排劳动力，消除失业现象，最有效地发挥人力的作用，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浪费，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建国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工业比较落后，同一些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我国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效地更迅速地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影响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是复杂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以至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只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途径，才能达到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这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谈谈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主要途径的几个问题。

第一，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并且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充分发挥机器在生产中的作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社会生产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进步上。谁都知道，使用机器生产与手工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0页。



生产，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使用机器紡紗的工人一天能生产几十斤棉紗，而一个使用手工紡紗車的人一天不过紡半斤纜左右。資本主义所以造成了比它以前任何社会都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进行了技术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

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就是提高劳动装备的水平，它是現代工业高度发展的結果。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速度可以远远超过資本主义国家，提高劳动装备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建国十多年以来，我国許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分別增长了几倍到几十倍。所以，工业劳动装备有了迅速的改善。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即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相比，每个工人平均生产用固定資产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动力机械总能力增长百分之七十九点二，电力增长百分之八十点四。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工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工业劳动装备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所有这些，对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繼續积极发展工业，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彻底改变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是个大国，工业比較落后，情况复杂，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只能是逐步的，改善劳动装备的过程也只能是逐步的。只有在現有工业化水平的基础上去考虑进行机械化、自动化的問題，才能有真正效果。

在現有企业里，开展技术革新，充分挖掘現有设备的潜力，这是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投資少、時間快、效果大的一个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重要办法之一。我国过去几年工业生产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部分就是采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們对于生产規律的認識逐步深入，很多已有的机器設備和生产工具都有可能也有必要进行某些改革，以便更好地发挥它們的作用。特别是比較陈旧的設備，进行技术革新的可能性更大。挖掘机器設備生产潜力的办法很多，例如，改革設備、改革工具、采用新技术、改善动力条件、建立流水作业綫，等等。

但是，任何机器設備，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性能和能力，这些性能和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对現有設備的改革和革新，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如果超出其一定的合理限度的技术革新，不仅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例如，适当增加装料量和加速装料，可以提高炼铁炉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装得过多过快，超出了高炉能够熔炼的能力，那么，不仅不能提高出铁量，反而会减少出铁量，甚至会造成事故。又如，我国有許多紡織厂原来罗拉轉速設計时的保險系数較大，显然，适当提高罗拉轉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把轉速提高到超过机器本身的負担能力，那么，就会增加断头率及发生其他事故，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降低劳动生产率，还会不合理地磨損机器，破坏机器設備。因此，在采取新的措施，挖掘設備潜力的时候，必須掌握两个原則：第一，一切革新要有合理的数据为基础；第二，一切革新要經過反复試驗，待成功后再逐步推广。这样，才能把进行技术革新、挖掘設備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放在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为了充分发挥物质技术基础的作用，必須不断地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熟能生巧”，在生产中，一切条件相同，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是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技术熟练程度高的人，可以生产出数量多、质量好的产品，而且可以减少物质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如果劳动熟练程度低，在同样的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就会数量少、质量低、消耗大、成本高。因此，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是一切生产部門和工人的經常任务。

在現代工业企业中，使用机器生产，是現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結晶。要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深刻認識并掌握机器生产的規律性。这就需要一方面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并反复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从而提高認識水平和操作技术水平。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方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进正規学校，从小学到大学，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現有的經濟条件下，人人都上大学是不可能的，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材还只能是少数。另一种方法是业余学习。許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开办的业余学校和函授教育就是属于这一种。这种方法更便于理論联系实际。我国已經用这种办法培养了成批的工程师、专家，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程度。这种方法在我国过去、現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內都是重要的。

不断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并且推广成功的經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我們已經作了并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这里特別应该重視的是青年工人向老工人学习的問題。老工人一般都有比較丰富的生产实际操作經驗，青年工人虚心向他們学习是迅速提高劳动熟练程

度的一条重要道路。过去几年許多工厂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之間訂立师徒合同，包教包学，技术人员帮助老工人总结經驗，教育新工人等等方法都是有效的，应当繼續采用。

第二，正确地組織工业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

机器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生产手段复杂，分工科学細致，它要求实行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可以更合理地組織和使用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原料、材料，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认为本企业需要什么就应该自己生产什么的想法和作法，是違反现代化企业生产規律的。这种作法，实际上是要求人們丢掉熟悉的业务，去干不熟悉的业务，分散一个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結果就必然要降低劳动生产率。当然，有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在生产主要产品的同时，只要經濟、合理，生产一些其他产品是可以的。例如，汽車制造厂，由于工厂拥有的設備很多，需要修理設備，建立机械修理車間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企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可能也不必要样样都自己去生产，有的可以自己解决，更多的应该依靠企业之間的协作。每个企业以全付精力搞好自己的专业生产，才最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专业化生产要求生产方向稳定。产品的品种变化过多，对专业化生产有极为不利的影響。因此，应该尽可能加强計劃性，并且尽可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实行专业化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使每个生产人員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要随便調动。固定每个劳动者的专业，才有利于提高技术熟练程度。一切有条件的企业，都应当按照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去組織生产。



机器生产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生产的連續性，它要求密切地协作。只有协作，才能发挥出集体生产的巨大威力。协作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并且可以创造出一种集体的生产力。在现代化企业生产中，机器把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结合起来，生产是連續性的，上一部分机器供給下一部分机器原料，各部分机器必須同时发挥作用。生产物在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进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直到产品完成。在手工制造业里，部分劳动者的直接协作，会在各組劳动者与各組劳动者之間創造一定的比例，在編制好了的机器体系中，各部分机器不断地互相推动，也需要在各部分机器的数目、大小和速率上确定一定的比例。有了这个正确的比例，才能搞好机器生产的协作。生产上有时出現一些薄弱环节，往往就是这种比例不合适。一切生产組織必須适应机器生产要求协作的这个特点，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調整这种比例。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更不能任意改变机器协作的这种体系。否則，就会違反机器生产的要求，降低劳动生产率。

工业企业的內部协作，不是自发产生的。任何集体生产中的协作，必須在高度集中統一的、有計劃的领导下才会产生作用。在我国工业企业內部，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負責制，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負責制，财务會計上实行总会計师負責制，一切个人实行崗位責任制，这些都是实现协作的重要条件。每个企业的领导，应该按照企业生产的客观要求，統一組織安排全厂的协作，一切个人，应该严守崗位，服从领导，认真进行协作。任何自由行动都会破坏

协作，降低劳动生产率。

第三，充分調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調动起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基础。

在工业企业里，調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工业企业調动和发挥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劳动者的解放，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广泛的、大規模的运用劳动竞赛，在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天才的可能。因此，列宁曾經指出，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中，“按社会主义原則組織竞赛应该是我們的一項最重要而又最有成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①。

什么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原則呢？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与資本主义竞争有什么不同呢？

資本主义竞争是这一方打倒另一方，从而統治对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原則，是广大群众之間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帮助后进的赶上先进的，先进者更加先进，从而达到普遍提高的目的。必須用社会主义原則去組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果没有这个原則，竞赛就会变成竞争，其結果，必然要造成生产混乱，降低劳动生产率。

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仅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則，而且要有正确的組織方法。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本家为了竞争，他們不擇手段，例如，壟断技术、互相封鎖、互相破坏，甚至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生命以达到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9頁。



自己的目的，等等。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为了共同提高，则采用各种必要方式，如观摩、表演、利用报刊等工具交流经验，尽可能快地把少数人的宝贵经验变成社会的财富；对后进者给予热情的帮助；适当给予他们以必要的物质条件，耐心帮助他们分析落后的原因，找出克服落后赶上先进的办法，等等。当然，别人的帮助对后进者来说只是外部因素，起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后进者要赶上先进的决定因素，是依靠自己本身的努力。因此，帮助者不能代替后进者本身的努力，后进者更不能单纯依赖别人的帮助去赶先进。那样是永远也赶不上先进的，即使赶上了也不能巩固。此外，在劳动竞赛中，还必须特别关心劳动者的生活，实行劳逸结合，保证所有参加竞赛的人都能经常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工作。没有这些正确的方法，也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顺利进行。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群众由于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经济上不受剥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资本家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应该继续加强政治工作，发挥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这绝不是可以说可以忽视正确的分配原则。恰恰相反，关心群众生活，执行正确的分配原则是不断提高和发挥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决定关键之一。越是在群众劳动热情高涨的时候，越要认真执行正确的分配原则，关心群众生活。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阶段进行分配的基本原则。它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只有执行这个原则，才可能巩固并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和提高广大

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求把加强政治工作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密切地结合起来。如果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那就容易使人迷失政治方向；如果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劳动者不能从劳动中得到应有的好处，那么，政治工作就变成了空谈。

把加强政治工作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结合起来，不是把两者混淆起来，更不是互相代替，而是既注意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群众明确自己的前途，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同时，又坚决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给予报酬。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灵魂，经济措施是政治工作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工作中，必须采取经济措施，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就应该相应地提高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就必须降低劳动报酬。对生产特别有成绩的个人和单位应该给予特殊的物质奖励。对那些由于主观努力不够而使生产不好的人员和单位应该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裁。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既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把两者分割开来的作法，都不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现按劳分配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实行正确的工资制度。工资制度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计时工资，一种是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的形式，使职工收入比较稳定。有些工作无法计件只能计时。计件工资制则更便于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制定工资制度的



时候，應該克服平均主义傾向，根据企业生产的特点，采用那种最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則的工資形式，才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并且切实执行按劳分配原則，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調动起来，并且坚持下去，給提高劳动生产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工业企业的經營管理。

社会主义企业拥有現代化的技术設備，广大劳动者有着高度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只有这些还不足以进行生产，更不足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使这一切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把这一切組織起来，使整个企业像一架运转灵活的机器。这就要求根据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生产的特点，加强企业管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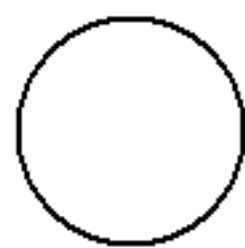
工业企业生产經營管理主要包括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技術管理等。搞好这些管理工作，就可以节约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中，认真实行經濟核算有重大意义。实行經濟核算才能做到以同样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收入抵偿支出，并且能够赢利。毛澤东同志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經濟事业，必須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尽可能改善劳动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①为了实现上述原則，要求企业必須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在生产中实行严格的定員、定額管理，精减一切不必要的人員，特别是大力精减非生产人員，降低生产消耗。

加强紀律性，健全各种責任制是加强企

業經營管理的重要环节。由于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現代化大机器工业生产，一个生产单位是由許多不同的部門組成的，一件产品有許多道工序。整个生产有着严密的科学性和連續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的工作，对整个生产都有重要影响。每个人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按照机器生产的要求完成自己的責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铁的紀律。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本家用饥饿政策来維持紀律，紀律也是一种階級压迫的表現形式。在社会主义企业里，消灭了階級压迫，工人階級是否可以不要紀律呢？或者是否可以稍加削弱呢？不能！列宁說：“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組織則靠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紀律来維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紀律来維持。”^②紀律之所以需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和机器生产本身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是社会化程度更大、并且将是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大生产，它更需要紀律。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維持紀律的目的和方法不同。資本家維持紀律的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他們采用饥饿政策来强迫維持紀律；而社会主义社会維持紀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組織生产，生产更多的产品，满足人民和整个社会的需要。无产階級的紀律是自觉的紀律。由于无产階級深刻認識到，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生活，他們完全自觉地自願地遵守铁的紀律。有了这种自觉的紀律，才

①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費用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頁。

② 《偉大的創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1頁。



有生产行动上的自由。因此，社会主义的纪律是可以更加巩固的。不正确理解这种“自觉”和“自由”，就会破坏企业生产的纪律，降低劳动生产率。经常深入地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是有效地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第五，工业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每个企业本身的努力是主要的，但是，每个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孤立进行，还必须必要的外部条件。

每一个企业的生产，从原料的采购到产品的完成，同社会许多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生产过程中如果这种联系中断，就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企业必须同有关的经济部门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协作关系。这里，除了要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使工业生产有足够的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以外，各个企业之间的密切协作，是每个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采掘与加工部门之间的协作，生产与运输之间的协作，这个生产部门与那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协作，等等。特别是专业化生产的企业更需要如此。一个钢铁厂，它不仅需要粮食、矿石，而且需要机械、电力，以至草绳、木材等等。所有这些，需要许多不同的工厂和生产单位供应。同时，不仅每个生产部门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物品，而且运输部门还必须保证按时将这些物资运到使用的单位。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否则，一个工厂的机器再好，工人的积极性再高，组织管理工作再好，也无法搞好生产，更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搞好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协作，首要关

键是，国家计划必须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来安排生产，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各企业之间采用的合同制，是保证有计划进行正常生产的重要手段。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严肃执行。对不执行合同的企业和单位，必须采取经济措施加以制裁，以保证实现合同。每个企业和每个单位，应该发扬主动精神，多为别人着想，积极支援别的企业和单位，但是，所有这些协作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和统一政策下进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要反对在协作中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其他妨害统一集中领导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必然造成协作上的混乱，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从而也必然破坏生产，降低劳动生产率。

必要的外部条件对每个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每个企业绝不应当单纯依赖外部条件。同时，每个企业对这些外部条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每个企业都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工作，力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外部条件与生产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这就要求每个企业在生产中要加强计划性，瞻前顾后，这样，就有可能克服某些暂时的外部条件不适应的困难，使生产不受影响，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深入认识并运用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各种有利条件，我们就一定能更加有效地更加迅速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



以身作则

吳介民

江西省有个劳动模范名叫文经珠，是九江县永安人民公社幸福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出色地领导群众把一个极端荒凉的沙洲地，开拓成为粮棉丰登的重要棉产区。有人问文经珠有什么领导经验，他谦逊地说：谈不出什么经验，只晓得带头干。

好一个“带头干”！这看来是一句很简单、很平常的话，但实际上却是一条异常深刻、十分宝贵的经验。

在广大的农村里，有无数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在群众中，积极劳动，哪里最困难、最艰苦，他们就奔向那里；不论在烈日曝晒的抗旱行列里，在严寒凛冽的水利工地上，或者是在风狂雨暴的防洪战斗中，都身先士卒，站在众人的前头。他们工作扎实，有高度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们总是以党中央的政策为行动的准绳，每做一件事，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群众讲透道理，把政策交给群众，取得群众同意之后，和群众一道去办；他们总是坚持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凡是新的技术措施和没有把握的事情，都亲自

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虚心向群众学习，用成功的事例，做出样子，说服群众，然后普遍付诸实施。他们生活艰苦朴素，没有半点特殊；处处识大局，顾大体，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乐意拣重担子挑，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和得失。群众赞扬这样的干部说：“咱们的干部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跟这样的干部走，咱白天不怕打雷，黑天不怕下雨，吓不了，跌不倒，心里是踏实着的！”“干部跟咱一起干，再苦也不觉苦，再难也不觉难。”就这样，干部生活在群众中间，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深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就这样，党的政策和作风在干部身上得到了活的体现。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得到充分发扬，干部和群众结成一条心，扭成一鼓劲，同自然界作着胜利的斗争。

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是做好任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干部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和斗争，表明我们的干部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群众中的一分子，是



人民的勤务员，是普通的劳动者。同时，干部通过劳动和斗争，又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了解了群众的要求，熟悉了实际的情况。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发现问题，集中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不折不扣而又因时制宜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发展。在这里，干部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战员，既参加战斗，又领导战斗。带头干，把领导和群众生动地密切地结合起来。

启发和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引导群众为实现党中央的政策而斗争，是我们每个干部的责任所在，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项根本要求。把党中央的政策交给群众，化为群众的意志，是个艰苦的宣传教育过程。这不仅需要口头和文字的解释阐述，而且需要干部的实际行动，需要干部带头干，需要干部的示范。因为实际行动，是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宣传，示范教育是引导群众最好的方法。中国有句老话：“身教重于言教”。群众认识问题，是从现实出发的，是着重实际效果的。他们重视的不仅是言论，而主要的还是行动。乡村流行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抬起头，摔开手，干部咋走咱咋走”。有许多事情，只有当干部自己行动起来，做出榜样，让群众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他们才会心悦诚服，从而自觉地热情积极地参加斗争。

言论和行动的一致，是共产党人的特色。腐朽的剥削阶级分子，为了掩盖他们剥削的实质和濒于灭亡的命运，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他们不敢揭露事物的真相，只能说假话，总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人们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来评判他们。无产阶级战士决不是、也决不能这样。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作为新兴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站在真理这一边，不需要、也不应该说假话。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我们说话是很认真的，对说过的话是要负责的。我们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目的不是为了说说好听，为了用来做装饰，而是为了传播真理，为了要在实践中贯彻，为了动员大家来做。正如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①因此，共产党人从来是说话算话，不尚空谈，并且身体力行的。

把“言教”和“身教”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是言行一致的具体表现。它像一根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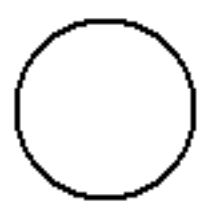
紅綫一样，貫穿在世界无产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宁主义創始人——馬克思和列宁的整个革命活动中，貫穿在中国人民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中。馬克思是无产階級的偉大学者，他毕生致力于科学的研究，建立了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体系，闡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认定資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它本身的灭亡而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指出了无产階級作为資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創造者的历史使命；馬克思又是无产階級的偉大革命家，他一直置身于无产階級解放事业斗争的前列，成为第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組織——国际工人协会的領導者，团結各国无产者，热忱地頑強地領導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卓有成效地开展斗争。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时代发展了馬克思主义。一方面，列宁在他的丰富的理論著作中，系統地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必然实现的真理；又一方面，列宁领导和組織了俄国无产階級革命运动，深入革命斗争的漩渦中間，給予具体的指示，在他领导下，俄国无产階級终于冲破了資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取得了无产階級革命的偉大胜利。毛澤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結合起来，胜利地領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业。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和言論中，历来都

提倡調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風。大家知道，第一个在我們党内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进行調查研究，正确地規定中国革命路綫、方針和政策的，不是別人，正是毛澤东同志。

从这里可以看到，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把理論的研究放在冷靜的科学分析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并且不疲倦地向广大群众宣傳这个科学的理論，实行“言教”；同时，他們对自己所宣傳的理論，信守不渝，身体力行，动员和組織群众起来斗争，使其变成革命的行动，实行“身教”的。把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革命性結合起来，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基本特征。兼有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品质，正是这种特征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創始人和中国人民偉大領袖身上的一种体现。

作为一个无产階級战士，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应该学习馬克思、列宁的榜样，学习毛澤东同志的榜样，以身作則，努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体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精神，体现党中央的政策和作風。既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傳者，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行者。只有言論和行动严格地保持一致，我們的宣傳才有战斗性，我們說的話才有力量。我們教育群众热爱集体，自己首先要热爱集体；我們教育群众热爱劳动，自己首先要热爱劳动；我們教





育群众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自己首先要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教育群众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自己首先要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我们干部确实做到言行相符，不仅注重“言教”，而且注重“身教”，那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在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就会“不令而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群众说：“干部好比火车头，火车头动了，车厢就会跟上去，火车头走得正，车厢就翻不了。”这话对极了。难道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言论和行动背道而驰，不以实际行动去履行自己的言论，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或者说了不做，那末，你的主张再好，你说的再动听，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甚至难免受到群众的指责和非难，落得个“虽令不从”的结局。这样做，就会使党中央的政策贯彻执行受到障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损害。这是我们所不取的。

言论和行动背离，是自由主义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果。毛泽东同志说：“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

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②自由主义，教条主义，都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如果有什么人受到它的影响，沾染了这个病毒，言论和行动背离了，那就应该自觉地坚决地清除它，使自己言行一致起来。

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吸引、带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整个革命和建设斗争中，在任何战线上，共产党人始终是吃苦在前，先天下之忧而忧，勇于牺牲个人利益，自觉地忘我地战斗在最前列的。他们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总是和群众站在一起，而且以带头干的模范革命行动，表明自己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过去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做了，今后我们还要这样做下去，并要求更多的人也这样做，而且要比过去做得更好，把党的这个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光大。

① 见《论语·子路》。

② 《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49页。



朝鮮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光輝業績

郝德青

英雄的朝鮮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統治的枷鎖下获得解放以后，十七年来，在朝鮮劳动党的领导下，披荆斬棘，艰苦奋斗，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驗，克服了无数难以想像的困难，不仅在祖国解放战争中赢得了偉大的胜利，而且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輝煌成就。

朝鮮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所获得的一切偉大成就，都是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鮮劳动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結果。朝鮮劳动党中央和朝鮮人民敬爱的領袖金日成同志，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朝鮮的实际，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及时地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制訂了正确的路綫和政策，并且从朝鮮人民的具体实践中，总結出正确的工作方法，引导全体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

朝鮮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黑暗統治下，度过了近半个世紀的殖民地奴隶生活。解放后，美帝国主义霸占了南朝鮮，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又迫使朝鮮人民陷入一个滿目疮痍的极为艰苦的处境。但是，在朝鮮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已經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且以鮮血捍卫了自己主权的朝鮮人民，并没有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畏縮不前，

他們鋼铁般地团結在劳动党的周圍，不屈不撓地在一片廢墟上开始了重建祖国的偉大事業。按照党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輕工业和农业”的經濟建設基本路綫，朝鮮人民充分利用本国的內部潜力，在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主义援助下，在短短的时期内就完成了經濟恢复工作，治愈了战争創伤，并且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为了早日摆脱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赶上先进国家的队伍，和实现自己最大的民族任务——祖国的統一，朝鮮劳动党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又及时制訂了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千里馬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以跨上千里馬的气概朝着社会主义奔馳”。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一致的响应，千里馬运动立即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广泛展开。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到处都掀起了万馬奔騰的跃进高潮，到处都涌現出惊人的革新奇迹。奔馳在千里馬运动最前列的朝鮮工人階級，不到一年就建成了具有三十万至四十万吨生产能力的高炉，三四个月就建立了一千多个地方工业工厂……。这种高速度的发展，使朝鮮工业的增长速度，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計划（一九五七——一九六一）期間，平均每年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在农村，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也以同样



惊人的速度在进行着。首先在实现水利化方面，由于广泛进行了水利灌溉工程和向农村大量供应了资金、建筑材料和水泵、电动机等机器设备，已经使水田变成了水利安全田，并且建立了旱田灌溉系统，从而基本上摆脱了水旱灾害的侵袭。农村发电站的普遍建设，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里(乡)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都已用上了电。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以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机械动力牵引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五，畜力牵引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八十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五。在农业用肥方面，到一九六〇年化学肥料的施肥量已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二。朝鲜农业技术改造的迅速进展，保证了粮食生产的不断增长，一九六〇年达到了三百八十万吨，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充分发扬了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忘我劳动的战斗精神，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一九六〇年就提前超额全面地完成了。朝鲜人民这种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跨上千里马奔驰前进的英雄气概，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祖国前途的赤胆忠心，而且也充分显示了他们一旦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自己武装起来，就会产生出多么巨大的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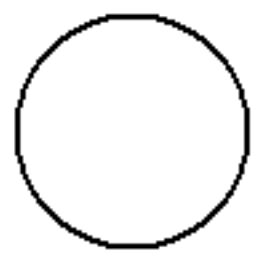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殖民地经济的畸形状态，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牢固基础，创造了将来能以现代化技术装备人民经济各部门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使朝鲜迅速地改变成为一个具有自主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朝鲜劳

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显著地得到提高，人们过着充满希望的幸福生活。

但是，朝鲜人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决心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七年经济建设计划，就是他们进一步巩固自主经济基础和向社会主义新高峰迈进的一个宏伟的战斗纲领。

根据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七年经济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依靠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头三年在更好地调整、和更有效地利用已经建立的重工业基地的基础上，集中力量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村经济，划时代地改善人民生活；后四年则把重点放在更加扩大重工业基地，改善它的技术装备，以便决定性地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方面，同时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根据计划，到一九六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二百二十左右，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国民收入将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七年内粮食将增长百分之七十，达到六百六十万吨；水产品将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八，达到一百二十万吨；纺织品将增长百分之一百六十，达到五亿米；煤炭将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将增长百分之二百六十，达到二百三十万吨。在农村和城市还将各建住宅六十万户。这个计划实现后，朝鲜就将完全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和发达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朝鲜人民在执行七年计划的头一年半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六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四，农业也获得了增产一百万吨粮食的大丰收，



使粮食产量达到四百八十三万吨，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两倍。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富裕，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每个农户的收入和一九六〇年相比，粮食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达到二千七百公斤（薯类除外），现金收入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达到四百元（朝币）。此外，国家还修建了一百八十三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三十七万平方米的农村文化住宅，新建了十六所大学。劳动人民除了得到劳动报酬外，还可享受到子女免费受教育、免费治疗疾病等国家和社会的福利照顾。一九六二年是朝鲜人民执行七年计划的第二年，也是完成七年计划中很重要的一年。今年的中心任务是夺取六个高地，即粮食五百万吨，纺织品二亿五千万米，水产品八十万吨，住宅二十万户，钢一百二十万吨，煤一千五百万吨。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金日成同志在指出夺取六个高地的重要意义时说：“占领六个高地，将在大大提高我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国家经济力量方面，是新的巨大的前进，是顺利地、完成七年计划所有任务的重要保证。”朝鲜人民正在满怀胜利信心，集中一切力量，为夺取六个高地进行着紧张的战斗。上半年计划执行结果，已经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实践证明，千里马运动为朝鲜人民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决定性的保证，它标志着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朝鲜劳动党通过对千里马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充分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了党

的战斗力。同时，通过千里马运动的深入发展，使生产上的集体革新运动和共产主义教育以及改造劳动者的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和主动精神。一九五九年春季和一九六〇年春季，降仙炼钢厂的陈应源作业班和青山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贞淑作业班，在金日成同志现场指导的启发和鼓舞下，先后发出倡议，在工业战线上和农业战线上开展了千里马作业班运动。千里马作业班运动是千里马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集体主义精神高度发扬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是发展人民经济的强大的推动力和劳动人民集体管理经济的卓越方法，而且是把千百万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的群众性教育方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的广泛开展，使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的行动方针，从而在经济和文化、思想和道德等所有领域中，掀起了扫除一切落后事物、不断革新、不断前进的革命浪潮，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动力。现在，千里马作业班运动已经扩展到工业、农业、运输、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保健等一切部门，千里马骑手的队伍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壮大。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有二百六十一万余名工人、农民、技术人员、职员和青年学生参加了千里马作业班运动，其中有包括二十四万四千人的九千四百多个集体获得了千里马称号，有九十四个工作班光荣地获得了双重千里马称号。在这支先进队伍的倡导和带动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量



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在生产斗争的實踐中，他們的智慧和才能有如泉水一般地涌現出來。一九六〇年，他們共提出了創造發明和合理化建議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件，被採納的有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件；而一九六一年光是被採納的就增加到四萬七千件，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這對加速朝鮮的社会主义建設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朝鮮勞動黨在領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中，一貫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堅定地依靠人民群眾，隨着革命形勢和生产建設的迅速發展，及時提出新的問題，引導人民群眾逐個加以解決，推動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不斷前進。一九六〇年二月由金日成同志在江西郡青山里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場總結出來的著名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就是朝鮮勞動黨一貫堅持的這種革命的群眾路線在新條件下的結晶，是三十年代抗日游擊隊建立起來的革命的工作方法的新發展。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要求各級幹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遇事同群眾商量；具體做好人的工作，幫助基層和群眾解決問題；充分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並且注意總結經驗，及時推廣，以便適時調整生產關係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有效地組織和發展生產，圓滿地實現黨的政策和任務。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的普遍推行，徹底確立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體系和工作方法，改進了各級幹部的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使各項工作進行得更加富有朝氣，面貌一新；同時，也更進一步深化了千里馬作業班運動，使社会主义建設的各個戰綫不斷掀起新

的高潮。

隨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飛躍發展和工作經驗的日益豐富，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又不斷地得到了新的深化和發展。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金日成同志通過對大安電機廠的現場指導，全面地、深入地瞭解這個工廠當前存在的問題，針對現有的領導體制、計劃、生產指導和技術指導等方面的缺點，作出了改編工廠企業的領導體制，建立新的生產指導體系、供應體系和工廠黨的工作體系的決定。這一新的體制，進一步加強了工廠黨委會的統一領導，加強了總工程師的作用，改進了原材料的供應工作，建立了由上而下負責地把原材料送到生產現場的新的供應體系。這樣就使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能夠擺脫許多可以擺脫的繁瑣事務，深入現場，專心指導生產，及時發現問題和及時解決問題，從而更好地貫徹黨的具體政策，進一步發展生產。緊接着對大安電機廠的現場指導之後，金日成同志又深入到肅川郡，具體指導和組織以郡（縣）為單位的農業合作社經營委員會的工作，採用管理企業的方法管理農業社，改變過去用行政方法領導生產的做法，以加強對農業生產集中、統一的領導，保證對農業社進行系統的生產技術領導和物資供應，從而加速推動技術革命運動的前進，促進農業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與此同時，郡人民委員會則把力量集中到商業工作和文化教育、衛生保健事業等方面，進一步促進文化革命和人民的福利事業的發展。

這些為適應生產力發展而採取的工業、農業管理體制的改變，為勝利地完成宏偉的七年經濟計劃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朝鮮勞



动党的傳統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是具有偉大生命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創造。

朝鮮人民在千里馬大进軍的行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設的每一条战綫上，自始至終貫徹着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早在朝鮮北半部創建革命民主基地的初期，金日成同志就明确指出：“要建設民主的国家，就必须确立自己民族的自主經濟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們就不能独立，不能建国，也不能生存下去。”本着这一精神，朝鮮劳动党在重視如何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兄弟国家的援助的同时，特別強調本国人民高度发揚自力更生、发憤图强的革命精神，充分挖掘內部潜力，为建設自己的祖国作出貢獻。一九六一年底在朝鮮劳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体會議上，金日成同志更具体要求所有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員，“用自己的力量，用本国的东西，更多地建設，探寻自己所沒有的东西，制造不足的东西”。勤勞勇敢的朝鮮人民正是遵循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的这些教导，高度发揚了艰苦奋斗的革命傳統，克服了各种障碍和困难，千方百計地挖掘潜力，以千里馬的速度，在一个短促的时间內，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民族的自主經濟基础。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已經建立起以机械制造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各种机器，装备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現在，朝鮮不仅自己能够生产中、小型机器設備，而且还能够生产冶金設備、发电設備等大型机器設備和汽車、拖拉机、电气機車和三千

吨級的船舶，从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为实现国民經济的全面技术革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二，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建立了大規模生产的集体經濟，基本上摆脱了水旱災害的威胁，能够为国家的建設比較有保证地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

第三，建立了以国内自然資源为基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基地，迅速地发展了化学工业，为大量生产人造纖維、合成纖維、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解决缺乏原料的困难打下了基础。在依靠国内燃料和动力保障工业的发展方面，也作出了显著的成績。

第四，管理經濟的人才和技术干部队伍正在迅速壮大。通过专业学习和业余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管理經濟的技术干部。一九六〇年，国民經济各部門的技术人員和专家有十三万三千名，相当于一九五三年的六倍以上。在整个国民經济部門的每一千名职工中，技术人員和专家的数目已在一九五三年的三十五名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八十六名。現在，朝鮮人民已經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管理和經營所有的現代化工厂企业，并且用自己的力量設計和新建各种大型建設工程。

朝鮮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輝煌成就，不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經濟威力，为和平統一祖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解放、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和北半部丰衣足食、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相反，南朝鮮在美帝国主义的霸占和軍事法西斯的統治下，已經变成一座完全被貧困、飢餓、疾病、恐怖和死亡所籠罩的人間地獄。美国侵略者为了长期分裂朝鮮，把南朝鮮作为征服整个朝鮮和在亚洲扩大侵略的桥头堡，在那里扶植一个又一个走狗，日益加紧对南朝鮮人民的血腥鎮压，并且破坏南朝鮮的民族經濟，使之成为美国侵略者的軍事附屬物和殖民地市場。現在，南朝鮮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已破产和沒落，数百万失业工人徬徨街头。在荒蕪的农村，断粮农户达一百万戶以上。相当于南朝鮮全部人口百分之五十的人民和二十万流浪孤儿正在飢餓和死亡的边缘痛苦掙扎。朝鮮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为了爭取祖国的和平統一，把南朝鮮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十多年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和一九六一年三月，先后提出了和平統一的綱領和促进和平統一的重大措施。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再一次向南朝鮮当局和南朝鮮人民提出实现和平統一的具体建議。建議严正地譴責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鮮所犯的滔天罪行，并号召全国人民在正义的反美爱国斗争中，“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迫使美国軍隊撤出南朝鮮和消灭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实现民族解放和使南朝鮮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朝鮮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所作的这一切努力，得到了南朝鮮各阶层人民广泛的响应和世界輿論的充分同情和支持。不管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鮮反动派怎样掙扎，絕不能阻止朝鮮人民爭取祖国和平統一的坚强意志。朝鮮的三千里錦綉江山一定能

够重新統一，朝鮮的三千万人民一定能够重新团聚。

对于朝鮮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的偉大胜利，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欽佩。朝鮮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經驗，和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都是值得我們学习的榜样。朝鮮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摯友誼，朝鮮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輝煌成就，以及他們坚定地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和英勇地坚守着社会主义陣营东方前哨的卓越貢獻，都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支持。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十分珍視这一国际主义的支持。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誼和团结，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鮮血凝成的，是建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牢固基础之上的。不論是天晴日朗，还是風狂雨暴，我們两国人民都将世代地永远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設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同生共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一起战斗，一起胜利。正如金日成同志所說，这种友誼和团结是无限宝贵的，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

我們坚信，在久經考驗的朝鮮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英雄的朝鮮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困难，实现七年計劃所規定的宏偉綱領，攀上社会主义建設的新高峰；一定能够在爭取祖国和平統一的偉大事业中贏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够在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爭取人类进步的共同斗争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从南斯拉夫经济状况恶化谈起

陈茂仪

南斯拉夫目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形势的严重迫使铁托集团在公开讲话中和官方报告中也不得不加以承认。今年五月初，斯普利特水电站举行落成典礼，铁托发表了长篇演说，在这种喜庆场合，竟大谈在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五月底，卡德尔在向南斯拉夫议会作报告时则说，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在去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暴露出来”。从今年三月以来，南盟中央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研究对策，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直到在最近举行的南盟中央委员会上，铁托还说，从会议的所有报告中，“找不到如何摆脱目前困难和南斯拉夫经济今后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的答案”。

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在经济领域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铁托集团曾经吹嘘，这些“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说什么“制度上的改变和其他物质上的改变及外汇制度、价格等方面的改变一起，必须导致处于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普遍的高度水平上的经济进一步稳定”。可是，经过这次“改革”，为什么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呢？

南斯拉夫去年进行的“经济改革”是从

外汇外贸制度开始的，首先让我们看看这项“改革”包含一些什么。

这项改革主要是进一步放松对于外汇外贸的行政监督，包括：实行统一的外汇清算牌价，代替过去的多种牌价；第纳尔（南币）贬值，把第纳尔对美元的法定汇率，由三百比一改为七百五十比一；放宽进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原料及再加工材料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实行所谓“标准关税制”，对不同国家分别给以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的待遇；取消过去由国家出口给予补贴的办法，鼓励出口企业自由竞争。总之，是在外汇外贸方面进一步实行所谓“自由化”。

铁托集团对外汇外贸制度进行这样的“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向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乞讨贷款，来缓和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多进口再加工材料，发展能供出口的工业，以求得减少外贸逆差。这是铁托集团一贯奉行的投靠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新步骤。但是，铁托集团竟然宣称，“这是我们总的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而不是满足哪个人的愿望或适应外界任何人的形式和利益。”

铁托集团在背叛社会主义以后，一直依靠向帝国主义乞援过活。十多年来，铁托集



团接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各种名义的“援助”，总额达五十多亿美元，其中“美援”占三十多亿美元。帝国主义通过“援助”，一方面打进南斯拉夫的市场，倾销过剩商品；另一方面在实际上控制着南斯拉夫的重要工业。这样，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对于西方国家的依赖年复一年地加深，结果就使外贸赤字逐年上涨，外汇支付危机日益严重，财政困难越来越大。而外汇和财政上的困难，反过来又阻滞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的发展。铁托集团自己承认，在这次“改革”之前，南斯拉夫经济出现了“某些方面的混乱”和“较大的比例失调现象”。面对着这种形势，铁托集团就搞了那么一套外汇外贸“改革”。铁托集团既然早就把南斯拉夫经济套在帝国主义的马车上了，自有其欲罢不能的苦衷。在这个意义上说，逐步建立一套完全资本主义式的外汇外贸制度，倒的确是铁托集团“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所要求的。

不是满足别人的愿望和适应外界任何人的利益吗？众所周知，铁托集团这次“改革”是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之下进行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专为南斯拉夫“改革”外汇外贸制度，提供了近三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美国和它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西方资产阶级报刊说，这是五十年代初以来，西方在“援助”南斯拉夫方面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对于铁托集团进行外汇外贸“改革”，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表现这样热心，是为了什么，那是不言自明的。奴才忌諱声张，主子却不願保密，铁托集团“改革”外汇外贸制度的内幕，很早就

已经在西方报刊上传开了。远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底，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透露，美国和它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南斯拉夫外汇外贸制度“改革”的“主要建议人”。这家报纸还说，美国“帮助”铁托集团“改革”的目的，既是为了“把南斯拉夫拉回到西方经济世界中来”，也是为了“把它拉回到西方政治世界中来”。这些报道可以说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对于南斯拉夫同西方世界现存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还表达得不够。

投靠帝国主义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铁托集团“改革”外汇外贸制度的如意算盘显然是落空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的年度报告承认，西方国家为南斯拉夫“改革”外汇外贸制度提供的资金，“大部分是同商品贷款相联系的”。这就是说，西方国家通过“帮助”南斯拉夫进行“改革”的途径，又为它们推销各种各样的过剩商品打开了方便之门。西方国家的商品大量倾入，对南斯拉夫工业生产的打击是沉重的。例如南斯拉夫有十六家有轨车辆制造厂，但是国家在一九六一年用于交通设备的投资，竟然没有一个第纳尔花在购买本国产品上，因为它已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大批交通运输设备。又如由于从美国进口了一千九百台已有五年至四十年历史的旧织布机和六百台新织布机，南斯拉夫的纺织机器制造工厂，在今后几年内将无法销售自己的产品。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去年“改革”外汇外贸制度对南斯拉夫工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还须指出，南斯拉夫现有五百多个进出口企业，由于国家取消行政监督，它们都各自为政，什么东



西“便宜”，就进口什么。这也使情况更为混乱。连铁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进口中的自由主义，什么都进口，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我们本国生产的发展。”

对铁托集团“改革”外汇外贸制度最大的讽刺是，外贸赤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上涨。据南斯拉夫官方材料，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的外贸贸易都是入超，而且外贸赤字步步上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平均每年的外贸赤字是四百九十四亿五千六百万第纳尔。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平均每年的外贸赤字又增至六百七十八亿八千一百四十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即实行外汇外贸“改革”的一年，外贸赤字竟达一千零三十五亿第纳尔，创造了南斯拉夫历史上外贸赤字的最高纪录；如果只就南斯拉夫对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说，情况更为严重。这一年南斯拉夫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四百三十二亿第纳尔，对“共同市场”国家的贸易逆差是五百三十八亿第纳尔，对“自由贸易区”国家的贸易逆差是七十一亿第纳尔，把对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加在一起，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亿第纳尔了。今年头六个月南斯拉夫的外贸赤字较之去年同期又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多。铁托集团所追求的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此可见一斑。

在对内方面，南斯拉夫一九六一年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改革”价格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

所谓“改革”价格制度，主要是扩大实行“自由价格”的范围，取消在黑色金属、有

色金属和木材等一系列部门中国家过去规定的限价，逐步过渡到“自由价格制度”，让各种商品的价格通过市场来“自由形成”。铁托集团说，要通过“自由价格”，来“自动地分配社会产品”，“进一步扩大市场规律在一切经济领域中的影响”。所谓“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方面是增加捐税和提高税额，保证联邦财政收入，同时实行地方财政自理，用铁托集团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各地“怎样赚钱就怎样过活”。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实行所谓“独立分配收入”制度，即废除统一的工资标准，政府不再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让企业在缴纳捐税之后，“独立”地分配余下的“纯收入”。同时，将企业再分为若干所谓“经济单位”，这些“经济单位”各自安排计划和生产，独立进行核算，并自行分配“纯收入”。这就是说，企业内部各个单位彼此之间原来的生产协作关系，变成了商业关系。此外，为了减轻联邦的财政负担，银行也实行分散化，把直接向经济组织贷款的任务，由联邦银行和专业银行转交给地方银行，发放贷款所需资金主要由本地筹集；连学校和卫生保健机构，也都实行“独立分配收入”制度，它们的经费改由所在区和“社会因素”（指企业和社团等）负责，国家不再拨款，这实际上把它们也变成了营业性的组织。

铁托集团说，进行这些改革是为了“迫使中央的计划和干涉缩小到日益狭窄的领域”，“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的刺激因素”。从实质上说，所谓“改革”云云，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在过去已经实行的“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分散化”和“自由化”，



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更加泛滥起来。这样的“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使南斯拉夫经济陷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铁托在最近的几次讲话中供认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且看铁托讲了些什么吧。他说：

“我们有这个或那个到明天就不得不关门的企业，因为它们生产的产品过剩，没有销路。”

“谁都想在自己的范围内，在本区、本县或者本共和国建立某些工厂”，而“不是按计划办事”。

“有些人在使用一定的资金时能够获得较多的利润，但却得不到所要求的款项，而另一些人尽管不能保证赢利，可是也许通过贿赂或类似手段，却得到了资金。”

“我们的商人，只要某些产品一少，就立即涨价。照我看，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会那么机灵。”

“我们的商业部门为了在市场上造成缺货和保持高价，就把商品囤积在仓库里。”

“我们这儿还有这样一些反常现象：由于整个南斯拉夫市场的这些缺点，出现了地方性封闭的现象和采取建立某些地方市场的做法，从而不能从个别共和国，例如从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跑到另一个共和国去销售或购买某些商品。”

“我们有大量的出口企业，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常常不诚实地相互竞争，甚至导致压低我国产品的价格。”

这还不是铁托谈到的所谓“消极现象和反常现象”的全部内容，但是够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这些现象难道不正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表现吗？长了秃疮的人忌諱“光”、“亮”一类字眼，干着复辟资本主义勾当的铁托们则忌諱“无政府状态”一类字眼。名者，实之宾也。尽管铁托们爱叫它“消极

现象”也罢，或者叫它“反常现象”也罢，事情的实质是决不会因此而改变的。

铁托集团一贯把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当作“官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加以攻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似乎还不是真正的公有制，而是一种“间接的公有制”，国家的经济职能应该立即开始消亡，国有制应该代之以一种“直接的和真正的公有制”。从这种修正主义的理論出发，铁托集团多年来在南斯拉夫搞了一套所谓“企业自治”。他们把原来属于国有的企业交给各企业的所谓“劳动集体”去“独立”经营。各个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上的供求情况，自己确定产品的产量、质量、品种和价格，自己负责采购原料并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办法，自负盈亏。各个企业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铁托集团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用“更高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关系”即“直接的和真正的公有制”，代替了原来的“间接公有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是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蜕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里所说的“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正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的基础。如果像铁托集团所做



的那样，反而把已经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分散到各企业的所谓“劳动集体”的手中，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那末，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就会重新起决定作用。换句话说，市场的自发势力不仅会决定各个企业产品的品种、数量和价格，而且会决定投资的方向，决定全部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陷于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南斯拉夫的现实生活也正是这样的。自从铁托集团实行“企业自治”以来，像盲目投资、盲目生产、营私舞弊、投机倒把、任意抬高物价等等现象，即铁托称之为“反常现象”一类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是早已出现了的。一九六一年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在过去实行“企业自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分散化”和“自由化”的范围和深度，同时还强调“进一步扩大市场规律在一切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这无异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因此，所谓“反常现象”一类的东西，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暴露出来。”

铁托集团实行“企业自治”，把企业交给各企业的所谓“劳动集体”，名义上是通过“工人委员会”来进行管理，实际上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完全由以经理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操纵着。铁托本人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认，在企业的领导人看来，“把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只是理论上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在那里作主的是个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不但享受高额工资，而且往往利用职权多分奖金，多拿补助工资，贪污肥己。去年

废除了统一的工资标准，就更便于企业领导人多占工人的劳动果实，企业中的工资差距比以前增大了。红利的分配，更为悬殊。在有些企业中每个工人从红利中只得到二千第纳尔，而企业领导人每人却得到八万第纳尔。许多企业领导人现在实际上过着资本家式的生活，有些人还在外国银行有秘密存款。“企业自治”制度的实行，已经使南斯拉夫产生了一个特殊阶层。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这个所谓“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近几年来，私营企业有显著的增加。南斯拉夫现在有私营手工业工场十一万五千多家，它们雇佣工人三十多万人，约占南斯拉夫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私营企业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而且发展速度相当快。如在铁托格勒一九六〇年九月有九十家私营手工业工场，一年后就发展到一百五十四家。铁托集团虽然规定私营手工业工场雇佣工人不得超过五人，但实际上有些私营手工业工场雇佣着几十人，还有雇佣二百多人的。这些私营工场主依靠剥削工人获得巨额利润，如贝尔格莱德的私营工场主获得的利润，一九五九年是一百八十亿第纳尔，一九六〇年二百亿第纳尔，一九六一年二百六十亿第纳尔。最近几年，在贝尔格莱德有几百个私营工场主建造或购买了住宅和别墅，约有一千个私营工场主拥有小汽车。

至于在南斯拉夫农村，现在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属于个体经济。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正在蔓延滋长，农



民已經向两极分化，富农占有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越来越多。据統計，一九六一年私人拥有的拖拉机达三千零十四台。私人拖拉机的拥有者往往利用雇佣工人包种个体农民的土地。不仅如此，铁托集团称之为“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社和农场所拥有的拖拉机，正在“日益迅速而大量地改变着旗号，从社会主义成分轉到私人手中”。买卖土地、租賃土地和高利貸之風也很盛行。所謂农場和合作社也都参加这些活动。尤其严重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区出現了一批“劳动力的販卖者”，这些人口販子依靠殘酷地剝削农民，大发橫財，有的在几天內就可以賺到一百多万第納尔。铁托集团根本否认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規律。他們认为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适合于南斯拉夫，一貫強調要“使农业摆脱行政领导因素，并把农业发展建立在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这条所謂“独特道路”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义道路，現在是看得更为清楚了。

铁托集团以“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相标榜，多年来一方面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过活，使南斯拉夫的經濟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实行一套所謂“自治制度”，使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一九六一年实行“經濟改革”以来的情况表明，铁托集团在这条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了，这就是目前南斯拉夫經濟陷入空前困境的根本原因。

铁托集团是怎样看待这个間題的呢？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四中全会上

說，“我們曾經认定存在着錯誤，但是沒有足够明确地指出其原因。”当然，要铁托集团“足够明确地”指出南斯拉夫經濟恶化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这样做，从根本上說，必須溯源于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綫，就近來說，必須追究去年的“經濟改革”，这等于說要铁托集团承认“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搞錯了，承认“經濟改革”的方向是錯誤的。承认吧，这可使不得；不承认吧，事情的真實原因的确是在这里。铁托集团显然陷于一种狼狽周章的苦境中了。

南斯拉夫现实生活的发展又一次使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理論遭到彻底的破产，铁托集团已不得不改变一些唱腔。就是在四中全会上，铁托說，“我必須說，行政的分散管理或自治是一回事，而經濟是另一回事，在經濟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分散管理，所以我国在經濟方面必須是一体的。”多年来一直实行“分散管理”的铁托集团，今天居然也唱起“經濟方面必須是一体的”一类調子，这是否表明他們已經有了悔过之心呢？絕對不是。铁托集团的领导人物在最近的讲话中都一致表示决不改变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其中铁托集团的“理論家”卡德尔在这方面說得最为明白。他說，“联邦执委会已采取了，并且在今后几个月还会采取一些措施，以在最薄弱的环节加强从行政上来調节关系。当然，已听到些怪話，說这意味着回到行政集中制。然而，这根本談不上什么回到行政集中制。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措施将加强自治制度，巩固我国政治和經濟制度所基于的



基础和原则。”注意！这里卡德尔不仅不是说要削弱“自治制度”，更不是说要取消“自治制度”，而是说他们还要加强“自治制度”。既然“自治制度”决不改变，那末，铁托说的什么“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最近一个时期，铁托集团为了推卸责任和平息劳动人民的不满，像煞有介事地在

“反对反常现象”。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在此以前，铁托集团不是进行过“反对反常现象”的“斗争”吗？可是，事到如今，“反常现象”反而愈演愈烈。原因很简单：铁托集团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则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现象在南斯拉夫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得更多。铁托集团称之为“反常现象”的东西，其实，正是所谓“自治制度”的必

所谓“特种战争”的真相

陈 原

一 “特种战争”

近来美国统治集团对于“游击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肯尼迪本人对“游击战”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这位总统一再公开告诫他的文武官员，切切不可轻视这种“最古老形式的”而现在又达到了“激烈程度”的战争，因为如今它“已经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且将来还会变得更加重要”云云。

肯尼迪们之所以对“游击战”着了迷，是由于他们从自己屡次失败的侵略经验中，看到了游击战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武器，异想天开地妄图将这种武器拿到自己手上，并以此抗拒无可遏止的民族民

主革命的怒涛。他们把这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叫做“反游击战”；他们把这个阴毒的设想纳入肯尼迪政府的“全球战略”时，将它唤作“特种战争”。

美国统治集团不是吹嘘它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和常规部队吗？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所谓“特种战争”呢？

当然，肯尼迪政府一直在疯狂地准备进行核战争。可是，在肯尼迪们看来，这种战争主要是用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决战的最后手段；而用核武器来对付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却是一种“不值得的”冒险，“其所造成的毁坏之大，将使通过这种途径的‘解放’成为毫无意义。”显然，肯尼迪之流在这种场合不“选择”核战争，并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



然产物，在铁托集团统治下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这些现象，完全是正常的。铁托集团既然决不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那末，所谓“反常现象”是必然还会要更加强烈地暴发出来。铁托集团一方面沿着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越来越深地陷入资本主义的泥坑，另一方面又大声叫嚷“反对反常现象”，这种掩耳盗铃的鬼把戏，是注定要

失败的。不久以前，铁托在讲话中透露，“上面有些人开始怀疑工人自治，他们认为工人自治没有行得通。”还说，“某些人说，假如情况不改善，他们就将举行罢工。”这表明在南斯拉夫，不仅劳动人民蕴藏着对铁托集团的巨大不满，而且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怀疑铁托集团的根本路线。铁托集团正在自食其背叛社会主义的苦果。

仁慈心肠。因为美帝国主义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武装斗争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要掠夺这些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榨取巨额利润。如果使用核武器，就将使这种目的无法达到。

用常规部队打“有限战争”吗？这的确是肯尼迪政府十分重视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说，肯尼迪政府战略思想“最大的变化”，是认为“十五分钟的战争”（即核战争）将不是“唯一的战争”。腊斯克曾把这种思想表述为：“（美国）不仅要拥有一支有效的灵活的核打击力量，而且还要拥有强大的极其机动的常规部队”。然而，美帝国主义要用“有限战争”来镇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如火如荼的民族民主革命，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去年春天，肯尼迪一上台就组织了雇佣兵入侵古巴，结果是一败涂地。正如跟白宫密切来往的美国记者斯·艾尔索普所说的，当时“肯尼迪的顾问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能够或者应当以核武器对付”古巴。肯尼迪也并没有派出美国常规部队去实现十多年前

艾奇逊所谓“令人神往”的行径——直接干涉，其所以如此，非不欲也，是不能也！照艾尔索普的估算，要“拿下并占领古巴”，需要将美国可用的地面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陷在这个暮尔小岛上”。唉，世界是那么大，美国这“宪兵”的力量是那么小，纸老虎原形毕露。这样的“选择”也不那么理想。

这样，“特种战争”就提到了日程。照肯尼迪的说法，“特种战争”连同“有限战争”是用来“补充”而不是“替代”核打击力量。这样一来，核战争、“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三位一体，就活灵活现地描出了一个六十年代美国战神的凶相！

为肯尼迪政府所特别选择的“一套全新的战略”——“特种战争”，成了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法宝”。据美国陆军部的小册子说，这是一种“小型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佬在南越进行的正是这种阴毒的“特种战争”，也就是用电网、屠杀、“三光政策”和“战略村”来镇压那里的人民。可见，这所谓“全新战略”的“特种战争”，只



不过是早已破了产的美国人出钱、出枪、出“专家”，叫各国反动派出炮灰去屠杀人民的旧阴谋而已！

二 “特种部队”

美国有一种用以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的“特种部队”。在肯尼迪的一手策划下，这种部队正在扩大和发展。据美国《时代》周刊和西德报纸透露，去年一年，美国“特种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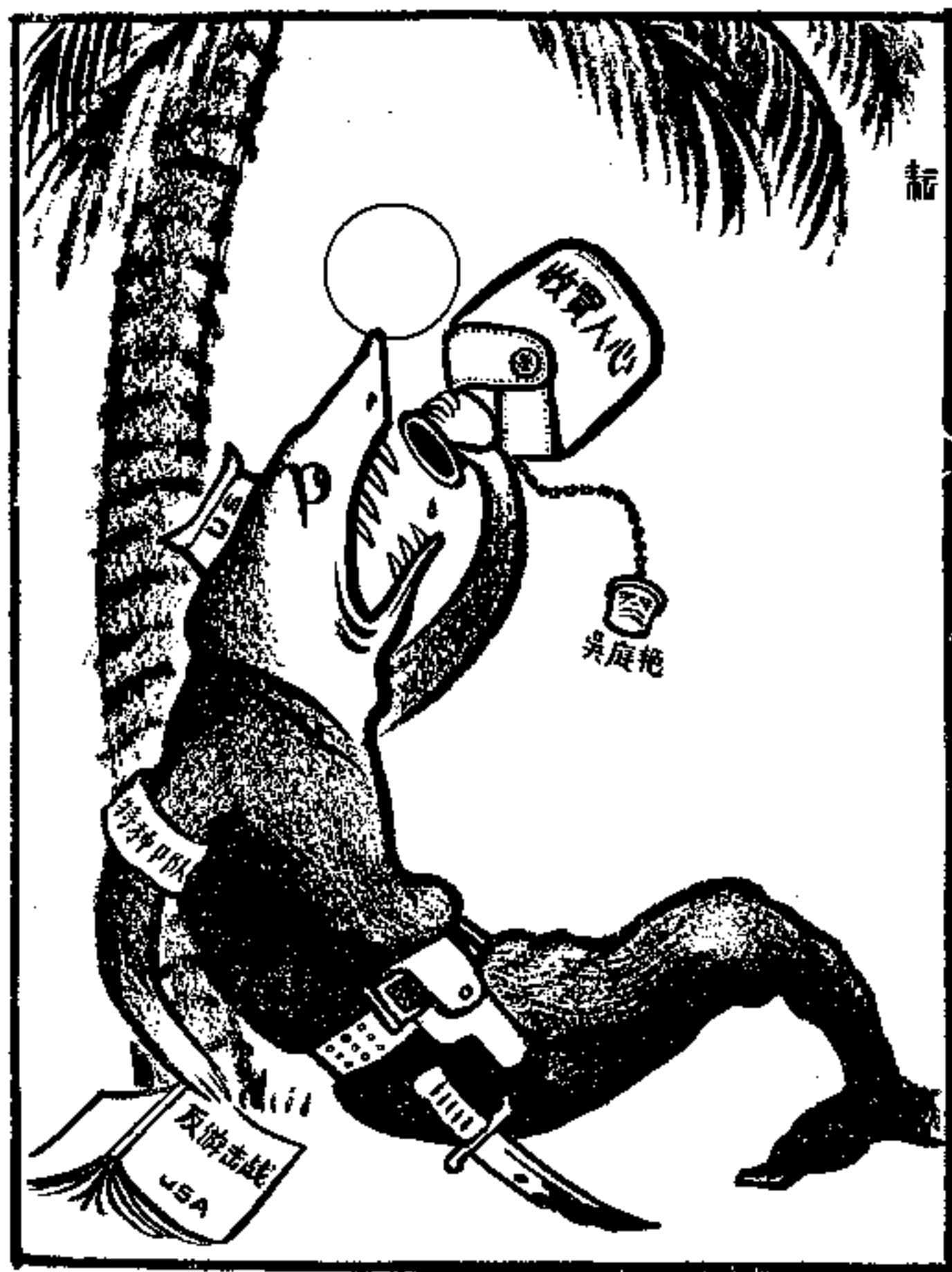
已从一千八百人增加到五千人，而美国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则宣称，明年将训练出五万七千人。综合西方报刊透露的消息，肯尼迪政府至少已经办起了四个陆军“特种部队”训练中心、五支陆军“特种部队”和一个空军“特种战争”训练中心。

训练“特种部队”的老巢是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哥堡。这里的“陆军特种战争学校”被人们称为“肯尼迪特种部队训练中心。”据说在这所占地五百平方公里的学校里，有

四分之一的“学员”是东欧各国的叛徒和流亡分子。这里训练的“特种部队”共有两支，它们被指定用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部队的成员多半是“志愿的”空军，经过了空降训练、一般战斗训练、特种破坏训练和特种战斗训练——包括在沼泽、在丛林作战的训练。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第二个训练中心，是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的“陆军加勒比学校”。这所学校搜罗了十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反动军官和特务共一百五十人。美国陆军发言人坦率地承认：这些“特种部队”的小组，“过去一年一直在拉丁美洲进进出出”。

第三个“特种战争”训练中心设在西德慕尼黑以南的巴



断水之鱼

吴松



特一托尔兹。这里的人员要研究行动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正规军战术和秘密警察”等等。他们经常演习夜战，还受到“配合地方游击队作战”的训练。

在日本冲绳设立的第四个训练中心，毫无疑问是“专门对付远东国家”的。据美国通讯社报道，大约有一百名“亚洲人”正在这里受训，而且“这支部队的成员已经到南越一些时候了”。

此外，美国还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设立了“空军特种战争中心”，主要是训练协助陆军“特种部队”的空中人员。《时代》周刊说，这个中心有七百九十五人，已经有许多被派到南越去参加屠杀南越人民的勾当。

由此可见，肯尼迪政府正从四面八方搜罗一批牛鬼蛇神，加以“训练”，然后派到各地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去干其不可告人的勾当。美国《陆军》杂志承认，这些“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反革命的“地方性骚扰活动”。这种破坏者还有“附带任务”，即侦察地形，煽动破坏或怠工，消灭进步政治领袖，释放反革命囚犯等等。

这批凶手注定失败的命运，可以从他们在南越的遭遇看得很清楚。一个到过南越的美国记者罗伯特·赫威特承认，美国的“特种部队”在南越遭到了失败，他们用电网和酷刑建立起的“战略村”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坟墓，这个记者说，“差不多全部适龄壮丁都逃跑了，不消说是跟游击队一起逃掉的。”《时代》周刊的记者也承认了美国的“现代化装备”斗不过地方的游击队，这位记者说游击

队“就像干草堆里一条蝎子那么难找，而同时又那么危险！”这句话很恶毒，但也说出了侵略者心里的恐慌！莫怪一个美国校官对记者说：“我的部下刚把越南人赶出一个地区，正在向另一地区推进，游击队又从他们的洞里钻出来；两个星期以后，局势又和先前一样的糟糕了。”

三 “从压迫下求解放”

显然，美国的官员们心里也明白，靠这批牛鬼蛇神的“特种部队”进行军事镇压，扑灭不了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肯尼迪就曾说：对付人民的游击战争，“归根到底，最需要的还是一项政治努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特种部队”有时也会收起血淋淋的短刀和炸药，摆出一副慈善家的尊容：修桥筑路，行医赠药，大搞其骗人的所谓“民间行动”。南越的“特种部队”就在“战略村”里进行反动的“心理战”宣传，并且建立什么学校、乡村医务所之类以及提供水井和电力等等，企图以此收买人心。真是六十年代的奇迹：“屠刀在手，立地成佛。”这种所谓“民间行动”也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进行着。照《华盛顿邮报》的讲法，搞这种“民间行动”的目的是：“美国企图大力改善亲西方的不发达国家的军队的‘公众印象’。”例如，一个美国陆军专家团带了一笔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援助赠款”，“帮助”厄瓜多尔陆军修筑公路以及建设其他公共工程。这家报纸说，陆军人员认为在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



国家中，“争取民众对陆军的支持，像在战争中争取制空权一样，是一种军事策略。”据哥伦比亚《时代报》揭露，负责这些“民间行动”的主要家伙，就是“特种部队”。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人民的游击队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儿女，人民是无穷无尽力量的源泉。中国的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佬在南越碰得头破血流，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统治集团以为，兜里藏着血淋淋的屠刀，脸上挂着欢喜佛的笑容，就可以取得这种“力量的源泉”。因此，美国陆军部在向兵士讲“特种战争”时，就强调“设法赢得人民的友谊。”侵略越南的美军头子哈金斯也屡次宣称：“要获致胜利，就必须赢得人心。”于是这个屠夫假惺惺地替南越某个村庄向后勤部门火急要求捞几条水牛！也是这个屠夫，除了要水牛之外，认为一个野战司令手头还得有“另外一批装备，额外一批粮食和额外一批药品，才可以随时赠送给农民”。

这个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美国屠夫，竟以为用几条水牛外加几针盘尼西林，就可以收买人心，然而，人民的心是收买不了的，这已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西德有个很反动的记者到了南越，他给汉堡《世界报》写过一篇通讯，似乎倒悟出了这条道理：“在现今，仅仅借助于金钱和兵士，是不能够保住一个国家的。”在他看来，要彻底镇压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有政治的目标、口号、理想、起码是一些愿望、信念。可是这里全没有。至少在西贡都没有。”

可不是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美国在例如南越这样的地方，进行“肮脏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他能提出什么政治目标、口号、理想、愿望和信念呢？“为民主而战”——这是道地的美国式口号，可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将美国拖进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去的口号，那时人们还不大懂得民主的真正意义，世界还没有经历过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现在呢？这个口号已经陈旧了，只能给美国戳穿了底。“以上帝的名义”作战——这也是道地的美国式口号，可这是六十多年前的美国总统墨金莱吞并菲律宾时所提出的，肯尼迪尽管满口上帝，他怎敢重复这个肮脏的口号呢？

美国有些报刊说，“特种部队”取了一个漂亮的口号，叫做“从压迫下求解放”。不知这是讽刺呢，还是实有其事，总之，这个口号是很动听的，但它却恰恰弄巧反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听到这个口号，难免要追问从谁的压迫下求解放。例如南越的人民，他们一定能够推断出来，必须从美国“特种部队”和吴庭艳反动统治的压迫下求解放，这岂不是火上加油，让民族解放的烈火烧得更加熾烈么！

历史有时真会作无情的讽刺：五年前的参议员肯尼迪有几句话恰巧给五年后的自己，判定了这个“新法宝”——“特种战争”的命运。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说过：被压迫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绝非镇压的暴雨所能扑灭的”，“而有史以来，要想束缚另一民族的自由，都是徒劳无益的”。



新中国的考古学

· 夏 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几年来，作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考古学，有了新的发展。工作的规模扩大了，研究的方法改进了，年青的考古工作干部也大量地培养出来了。在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中，许多地方发现了古代居住遗址和古墓，出土了许多重要的古物，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全国科学研究机构、文物机构和高等学校里有大批的考古研究工作者，进行野外和室内工作，从实物史料来探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样，就进一步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就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作些论述。

* * *

我们知道，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人类的起源问题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是要依靠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的。三十多年前，发现了北京猿人（即“中国猿人北京种”）及其文化，证明人类很早便居住在我国境内，我国可能是最初人类形成的摇篮之一。解放以来，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重要的有山西襄汾县丁村遗址。这里于一九五四年发现了丁村人化石及同时出土的二千多件石器，经

过研究，知道丁村人比北京猿人为进步。一九六〇年山西芮城县匭河出土的石器，据发现人说，比北京猿人还要早一些。现在我们可以将我国境内人类发展的几个基本环节联系起来。最近，关于北京猿人是不是最早的最原始的人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争鸣。北京猿人已知道用火，可以说已进入恩格斯和摩尔根所说的人类进化史上的“蒙昧期中级阶段”，不会是最古的最原始的人。匭河的旧石器也有比北京猿人为早的可能。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的研究。

* * *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受到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的特别重视。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利用粗糙的打制石器。他们的经济生活贫乏，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也不多；但是，近年来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等省（区）内，仍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地点多处。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引起了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定居下来了，同时也开始驯养家畜和制造陶器。石制和骨制的工具也有所改进。解放后，新中国

* 详细报道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



的考古学者对于这时期的农业部落，做了比较广泛的调查和一定的研究。十几年来，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三千处以上，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一百多处。例如，西安半坡，发掘到一个原始氏族社会的农业村落遗址，保存有许多较好的住屋基址和陶窑，居住地外有一道壕沟，沟外还有当时的氏族公共墓地。在这里发现了精美的彩陶器和石制或骨制的工具，还发现一个小罐盛着粟子。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址，在黄河流域很多。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也发现了经济生活与它相同的农业部落遗址，但是文化类型不同。这里主要粮食是水稻，所使用的陶器和石器类型也不相同。在内蒙古、新疆等草原上又发现了许多不仅文化类型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不同的文化遗址。他们的住址多是仅有石器和陶片，罕见灰烬堆积层，可能是过着游牧生活。石器多是打制的细石器，与农业部落的磨制的大件石器不同。关于这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互相关系和时代先后等问题，我们正在继续探讨中。此外，因为没有找到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遗迹，所以，对于我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冶金技术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在这个时期，我国境内不同地区的居民的历史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差别。在黄河流域，这时期出现了阶级社会、国家和文字。在它的周围地区的许多部落，虽也有采用了冶铜技术，但仍生活在原始社会里。解放后，发现了不少殷商（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和周代（公元前十一——三世纪）的青铜器。在安阳、洛阳、西安等处，我们都

曾发现过整批的青铜器。我们还曾在安阳、郑州、侯马等处，发现冶铜的作坊，有泥范和铜渣等出土，因而对于这些精美的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铜和锡的探采、提炼和冶铸，需要比较复杂的专门知识和技术。青铜制造业和别的手工业跟农业分离了。铜矿和锡矿并不像石器原料的岩石或陶器原料的泥土那样的到处都有；它们的产地只有几个地点。由于工业与农业分工，手工业本身各部门的再行分工，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便发生了。青铜可以制造工具和武器。在中国古代有了青铜器的时候，手工业方面已使用青铜工具。但是，农业工具是否大量使用青铜，这在考古学界仍有争论。

在铁的发展和冶铁业的发展后，在农业和工业的工具方面，铁器逐渐完全代替了石器。我国开始用铁的时代，虽然在早已有了文字的时期中，但是仅仅根据文字记载，仍是无法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解放后，我们重视对古代铁制生产工具的研究，并且在这方面有了重要的收获。我们发现了战国至汉代的许多早期铁器，一九五三年还在兴隆古洞沟发现了战国晚期的铸造农具、车具等的铁范。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发现好几个重要的汉代矿坑和炼铁作坊的遗址（巩县铁生沟、南阳古宛城等），知道当时已有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等，还有矿石加工场、藏铁坑、配料池、淬火坑等附属设备。这些发现，表明当时我们祖先已经了解到铁矿的特性，发明了高温的炉子和能产生高温的燃料，并使用适当的熔剂，以便加速把铁提炼出来；同时了解到铁的特性，利用含炭量不



同的铁，制造不同用途的器物，并且知道淬火可以提高铁的硬度。

对于中国古代另一种重要的手工业——纺织业，我们也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过许多陶制或石制的纺轮和印有布纹的陶片。对于青铜时代的殷代，在安阳发现的丝织品，有些还织有斜纹的小纹样，知道当时已有织布机，并且已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织布机。长沙的战国墓出土的有花纹更为复杂的丝织品。在新疆尼雅和吐鲁番，发现了汉、唐时代的华丽多彩的织锦，说明当时已有了提花机。我国的丝织品从汉代起便已闻名于国外，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北到西伯利亚，西到叙利亚，都曾发现当时我国输出的丝织品。我国织造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上面已说过，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了制陶手工业。解放后，我们在好几处都发现了当时的陶窑，研究了它们的结构后，我们对古代制陶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殷代已有了以高岭土制造的带釉陶器，但烧窑火候不及瓷器高，胎子还没有瓷化。西周时代的带釉陶器已有所改进，近于瓷器。到了三国时，在南方便有了青瓷。在江浙一带发现了孙吴时代的青瓷器，还发现了晋代和南北朝时的青瓷窑址。唐宋时代，我国的瓷器更有所改进。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瓷窑址，还发掘了著名的龙泉窑和耀州窑。在前一处有长龙式的烧窑，在后一处还发现了作坊、晾坯场、堆料场等遗迹。我国重大发明之一的瓷器，从唐宋时代起，也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在亚洲沿海的许多地方以及非洲的东

北部，都曾发现过我国唐宋时代及以后的瓷器残片。

商品生产增长后，出现了金属铸币和度量衡工具。解放后，我们发现了许多早期铁器时代（战国和汉代）的货币和尺子、量器及天平法码，还在秦咸阳遗址找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版。隋唐时代，国际贸易繁盛，我们在西安等处发现了当时东罗马的金币和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同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交通运输工具，我们在河南安阳、辉县、湖南长沙、广东广州等地发现了从殷、周至汉代的车和汉代的木船与陶船的模型，经过研究，搞清楚了它们的构造。这是解放后的重要收获之一。

关于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单独根据考古资料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面貌，我们主要地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来了解它们。解放以来，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的稀疏和遗址内遗物的贫乏、简陋和零散，表明它们的社会结构最初还是原始人群，后来进入了早期氏族社会的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部落住址的布局和公共墓地的情况，表明他们起初是繁荣的母权氏族组织，后来进入父权氏族社会。至于某一种文化类型在某一时期内是属于母权或是父权氏族社会，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在青铜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殷、周王国，已是早期奴隶占有制的对抗性社会形态。这时候已有了文字史料，但是仍需要考古史料来加以印证。一九五〇年在安阳武官村发



掘了一座殷代晚期的大墓。在墓中和墓外殉葬坑內，發現有三百多人殉葬，有些只見頭顱而沒有肢體。一九五八年在安阳后崗的一個殉葬坑中發現埋有五十多個人。在鄭州、輝縣、安阳等一般中型墓中也有殉葬人的。這些人看來是屬於當時社會中被統治的階級——奴隸。西安張家坡的西周中期的墓中還是有用人殉葬的，後來便罕見這種現象了。這可能是奴隸制發達後，奴隸被視為有用的工具而不輕易殺殉了。西周的社會性質，在史學界是有爭論的。解放以後西安禮西地區的考古發掘，證明西周的生產工具狀況和手工業技術水平，和殷代大体相同。墓葬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戰國時代起，墓中埋藏陶俑和木俑，許多是代表服役於主人的家庭奴隸。漢代墓中的明器（倉、灶、井和生活用具的模型）開始占重要地位，反映等級制度的禮器逐漸減少。這表明當時已由領主封建制轉到了地主封建制。南北朝時代的墓中，常有成群的武士俑，可能代表當時有人身依附關係的部曲。

自青銅時代起，我國不同地區的社會發展出現了顯著的不平衡。奴隸占有制的殷代和西周時期，黃河流域中游和下游以外，仍是保持着原始氏族社會組織。這可以由解放以來這些地方所發現的文化遺迹看出來。在西漢時期，鐵器已代替銅器，漢王朝直接統治下的郡縣已產生了封建社會形態。但在解放後從雲南晉寧石寨山所發掘出來的文物來看，顯示當時該地仍是青銅文化下的奴隸占有制。這裡發現的大量銅器中，有許多是表示奴隸從事生產的銅人像。漢代的邊緣地帶，如現今的吉林、黑龍江、海南島等地的

屬於漢代的文化遺址及出土物，還保持着新石器時代的傳統，可見這些地區的居民在那時仍然生活在原始氏族社會。

* * *

對抗性的階級社會產生後，統治階級為了剝削和奴役與它相對立的階級，國家便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產生出來了。根據傳說的資料，我國的國家產生的時代似乎是在夏朝初。可以與文字史料相印證的最早的考古資料，在解放以前僅有殷代晚期的安阳殷墟。解放以後，我們有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發現。一九五二年在鄭州二里崗發現了比安阳小屯為早的殷商遺存，後來在鄭州洛達廟和偃師二里頭等地，又發現了比二里崗更早的文化遺存。這個時期已有了小件的青銅器，陶器中有後來殷代晚期墓葬中所常見的觚、爵的祖型。二里頭類型的文化遺存是屬於夏文化，還是屬於商代先公先王的商文化，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我國的國家起源和夏代文化問題，雖已有了一些線索，但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才能得到解決。

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晚期，物質財富增加了。為了防禦的需要，部落或部落的中心地，常以濠溝或城牆圍繞着，或兼而有之。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居住區的周圍便有深溝。到了對抗性的階級社會中，防禦的需要更為增加，代表統治階級的政府，更經常築城和挖溝。城市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也常常是經濟中心或文化中心。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大城市興起。如齊的臨淄、燕的下都、趙的邯鄲、鄭和韓的新鄭、楚的紀南城（郢都），都圍繞有夯土城牆，現今仍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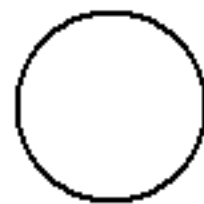
部分保存着。解放后会进行调查，并加以保护。在山西侯马发现了东周古城，曾作过几次发掘，有了重要的收获。这可能是晋的新田，它在战国时仍是一个繁盛的都市；遗迹有城墙、壕沟、土台建筑址和许多手工业作坊。秦的咸阳城也开始发掘。至于汉、唐的长安城，更是解放后考古发掘的重点。我们已发掘到古长安的城門、宮殿、街道、市場等遗迹。汉、唐的洛阳城，也已开始钻探。这些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将使我们不仅知道当时都市的布局和建筑技术，并且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也会有更深的了解。

* * *

关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如艺术、宗教等，考古研究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解放以后的考古工作，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收获。上面提到，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和了解，考古资料显然起着主要作用。至于古代造型艺术的研究，即使在有文字史料的时候，也是主要地依靠实物史料。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它的艺术价值是举世公认的。解放以后，累积的材料增多了，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它的花纹的结构的匠心和它的演化的过程。安阳、西安等处出土殷周时代的青铜器和玉器，信阳和长沙的战国漆器，望都与辽阳的汉墓壁画，四川的汉画像砖，沂南和安丘的画像石，新疆的汉唐织锦，曲阳和成都的佛教石刻造像，炳灵寺等新发现的石窟寺中的造像和壁画，战国及以后各地的铜镜（尤其是长沙的楚镜和洛阳的唐螺铜镜）和陶俑（尤其是西安的唐三彩俑），六朝的越窑和唐、宋

的白瓷、青瓷，晋宁石寨山的铜器等，这些在解放后所发现的重要艺术品，是我国艺术史上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至于一般的艺术品，更是数以万计。因为它们都是考古工作中的发现，不仅不会具有假古董，而且由于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多数是可以精确地断定年代的。有了这一批有确定年代的标本作为准绳，对于我国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点和每一时代如何继承及发展前一时期的艺术传统等问题的研究，都有了可靠的基础。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家协作，共同研究这些材料，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一定会作出重要的贡献。而画像石、壁画、陶俑、木制或陶制模型等，又为建筑、音乐、戏曲、舞蹈等方面的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宗教信仰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当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料食物，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且（祖）的发现，表明当时有生殖崇拜的习俗。至于彩陶上所绘的各种动物花纹是否代表图腾崇拜或仅是美术装饰，在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术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周代占卜术衰落，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战国时代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上的怪兽，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东汉晚年墓中有的朱书“镇墓罐”，南朝墓中的堆塑人兽的“魂魄瓶”，南北朝时开始出现的墓中买地券等，都和当时的道教信仰有关。汉



代长安城南郊发掘到的礼制建筑遗址十多处，也是和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发现。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寺的建筑遗址、造像和壁画等实物史料，都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时期转入文明时期的标志。解放以后，我们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殷墟稍早的卜骨上的文字，但仍属于殷代甲骨文字的系统。殷周有铭文的铜器也发现很多，有些替我们增添了很重要的文字史料。长沙和信阳二处所掘出的四批竹简，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简册。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和整治竹简的刀削等。一九五九年，武威汉墓中出土了竹木简四百八十根，主要的是七篇“仪礼”。它是第一次发现的西汉成册成部的经书写本，对于汉代书册制度和汉代经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属于少数民族方面的，有四川出土的战国至汉初铜器上现仍未能通读的巴蜀文字，有新疆出土的古代佉卢文的木简和古维吾尔文的木简和写本。

* *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许多民族都有它们的族源问题和它们的发展的历史面貌问题。考古研究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就汉族的形成问题而言，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有这种反映。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原的华夏族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相融合，但是和长江流域的巴、蜀、楚、吴、越等族的文化还是不同。这种不同也表现在考古发

掘所得的物质文化遗存中。经过了周代的八百余年，这些长江流域汉语系统的诸民族逐渐消失它们的特征，构成汉族的一部分，不复能分辨开来。到了汉代，汉族的形成过程更推进了一步，汉族的构成部分更包括长江以南地区的闽、粤等族人民。就出土的考古材料来看，可以了解汉族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但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各兄弟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文字史料，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这便需要考古资料来补充。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种尚在分化形成中，还谈不上民族区分。至于新石器时代，我们在兄弟民族地区，解放后会发现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为研究他们古代原始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汉族有了文字记载后，各朝代都有关于兄弟民族的叙述，可以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解放后在吉林、长春地区发现的古青铜器文化，可能是周代肃慎族的遗存。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内蒙古东北部扎赉诺尔和北部集宁市二蓝虎沟等处，解放后都发现了西汉时代墓群，出土的有透雕的野兽花纹铜牌饰等，当为匈奴族的遗物。也有人认为，西岔沟的文物和内蒙古的一般匈奴文物有些不同，地区也偏东，应该属于东胡的乌桓族。内蒙

** “民族”一辞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在资本主义发生时才形成的共同体。广义的包括部落、部族和上述的狭义的“民族”。本文中的“民族”是采用广义的意义。



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南部发现一些青铜短剑墓，时代较早，属于东周。对它们的族属，有匈奴和东胡二种不同的看法。吉林辑安、辽宁桓仁等处的高句丽墓，吉林敦化的唐代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和东北及内蒙古的契丹族辽墓，因为有墓志为证，可以确定无疑。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的两座北魏墓，当属于鲜卑族。元代蒙古族的遗迹，有上都遗址，解放后会加以调查。内蒙古宁城的近代中京大名城，也曾发现元代文物。对于新疆各处古城、古居住址和寺庙，曾做过几次的调查工作。在和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处，还做了一些发掘工作，所发掘出来遗物属于汉、唐时代。在北疆昭苏一带所发掘的土堆墓，可能是属于中世纪的突厥族。青海的古迹也做了一些调查和发掘，早期的当属于周、汉的羌族（羌族似为后来藏族的一部分）。西藏地区于一九五九年也做过文物调查工作。西南地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就服装及发髻的样式看来，除了古统治地位的“滇族”以外，还有他们统属下的好几个不同民族，有的或者便是《史记》中所提到的“焉”、“昆明”、“靡莫”等族。在云南还发掘过南诏国的遗址和大理国的古墓。在广西的宁明县花山等处发现古代崖画，是属于古代僮族的创作，年代可能早到唐代或宋代。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丰富多采，描绘出从前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古代滇族社会的图景。

我们知道，各兄弟民族在祖国的历史上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重视兄弟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对于以上列举的一些实物史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古代有许多住在

边远区的少数民族的名称，到后来消失不见了。这些古代的少数民族和现今该地的兄弟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了解现在兄弟民族的形成过程，将有很大的帮助。

* * *

解放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一方面使我们有可能利用考古资料来解决从前单凭文字史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过去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导下，有些问题经过讨论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仍在继续争论中。我们要不断地改进考古研究方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打好理论基础。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等）和运用文字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现在已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建立一个实验室，由体质人类学家来研究古代人类骨骼，化学家来分析古物的成分和制造过程，原子物理学家来充分运用同位素碳¹⁴去推断古物年代。有些工作已取得一些成果，有些工作正在开始着手。这说明利用最新的考古研究方法，会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更重要的新成果。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考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得非常起劲和顺利，并已有了重大的收获，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累积资料，深入研究，以便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